

# 先秦时期安徽城邑的起源与发展

朱华东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原始时期安徽南北方聚落出现早晚有别、分布不均; 聚落选址因地制宜, 规划布局合理; 类型丰富、规模有别; 并开始出现了区域性政治宗教据点。夏商周时期安徽城邑分布和选址延续了原始时期的特点, 但城址数量相对较少; 西周城址开始在局部出现, 春秋后期开始进入一个筑城高峰期, 并出现了功能上的区分。安徽先秦城邑发展的特征可分为历时性与阶段性两类。

**关键词:** 先秦; 安徽; 城邑; 阶段特点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4)05-0161-06

**Introduction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in Anhui Province in Pre Qin Period**

ZHU Hua - dong

(History Department , Anhui University , Hefei 230039 , China)

**Abstract:** In Anhui's primitive period , 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was not equal in south and north area. The settlements were buil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sizes. Some of them had developed to a political and religion center. During the Xia - Shang - Zhou periods , 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followed the characters of early time and still lacked towns. After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a peak season of towns' building appeared and make a function distinction among them. Two characters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Anhui's cities: diachronic and periodic.

**Key words:** Pre Qin period; Anhui; towns and cities; stage characteristics

城的产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要素之一,也是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如同事物发展规律一样,城邑的诞生、发展、成熟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安徽地跨江、淮两大水系,地理位置显著,气候宜居,考古资料表明,早在百万年前安徽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至新石器时期,聚落犹如雨后春笋般在江淮大地形成、发展、崛起。三代时期,安徽真正意义上的城开始大量兴建,进而形成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先秦聚落和城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城邑的起源和发展,乃至秦汉之后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学界对先秦城邑的研究并不充

分,多以局部区域为切入点<sup>①</sup>,或从文献角度考证城邑的地望<sup>②</sup>,而对整个先秦时期安徽,尤其是新石器晚期至商

<sup>①</sup>参见唐晓峰等《芜湖的聚落起源、城市发展及其规律的探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王峰:《堰台遗址聚落形态考察》,《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②</sup>此类文章中以鄂君启节铭文所涉及到的运输线路及相关地名的考释文章最为集中。此外,古居巢国等古地名也常被讨论。

周时期城邑变迁,讨论、概括的并不充分。近年来,各类考古成果不断公布,为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本文着重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分三个时期概括先秦时期安徽城镇起源、演变的过程及特征。

早在两百万年前,就可能有一支直立人群体在繁昌人字洞内过着穴居生活,这是安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而晚于一百万年的安徽古人类活动遗存数量很大,生活的地点也较多样,如皖南水阳江流域二级台地,发现有人类的临时活动营地,和县猿人洞内发现猿人化石等。这一时期人类单个群体数量少,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流动性很强,时常会将岩洞或露天之地作为临时栖身之所。安徽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早晚有序,分布于人类进化的各个时段,充分表明安徽环境的宜居性。

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安徽开始出现人类定居生活的聚落。根据历年的考古调查,目前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相关遗址约 400 余处,已经发掘的近 50 处。已发掘最早的单个聚落时代可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前<sup>①</sup>,以淮北地区石山子、古台寺、小山口、蚌埠双墩等遗址为代表,但数量不多,呈零星分布状态。根据这些遗址资料可知,当时的人类已开始饲养牲畜,但采集、渔猎仍为必要的辅助生存手段。

五千年前后这一段时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此时段安徽史前聚落的材料最为丰富,类型多样,并开始出现了城址,尤其以蒙城尉迟寺<sup>②</sup>、固镇垓下<sup>③</sup>、怀宁孙家城<sup>④</sup>、含山凌家滩<sup>⑤</sup>等聚落遗址最有代表性。但由于史前时期遗址发现和发掘数量有限,对全面认识这一时期安徽聚落特点造成了不少困难。现就现有资料归纳安徽史前聚落的特点:

#### (一) 聚落的分布与时间南北不均

从时代看,北方年代早,文化延续时间长;南方年代晚,文化延续时间短。其中淮北和沿淮地区的聚落年代在距今 8000—4000 年间,宏观年代框架已没有太大的缺环,而且单个遗址延续的时间都较长,文化层较厚,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江淮地区 6000 多年以上的遗址较少,大多数在距今约 6000 至 4500 年左右,单个遗址的延续时间不长,文化层稍厚,少数遗址虽然延续时间较长,但各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缺环,具有一定的间歇性;皖南地区除个别遗址的年代可能早于 6000 年以前外,绝大多数在距今约 5000 年前后,龙山时代晚期的遗址也很少,而且单个遗址的延续时间普遍较短,文化层较薄,很多遗址只有一个时期的堆积。

遗址分布密度也南北不均,其中北方多而密集,南方少而稀疏。淮北和沿淮地区的遗址约占总数的一半以

上,尤以东部最为集中;江淮地区次之,主要集中在皖河流域和环巢湖一带;皖南最少,分布较零散,以沿江平原和新安江流域相对较多。

#### (二) 聚落选址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合理

由于各地环境、地貌不同,聚落选址的方式上也存在南北差别。如淮北平原和沿淮一带的聚落,早期一般位于距河湖较近的山前平地,晚期大多都位于平原区,遗址一般呈垆堆状,与河南东部和山东西南部的遗址基本相同;江淮地区主要是低矮的丘陵和岗地,遗址大多数位于丘陵和岗地靠近平地的平缓地带,其中一种狭长平缓、面向河流的长岗常成为先民们的首选之地;皖南地区除沿江平原的遗址一般分布在高墩之上外,其他区域遗址的选择也是因地制宜,多有不同,但总体上常在河边的一、二级阶地上。

已发现的聚落遗址中,以大型聚落的选址尤为考究。以凌家滩为例,遗址坐落在太湖山下,周围丘陵起伏,地势北高南低,裕溪河流经南部,遗址依地形而建,整体轮廓呈条形走势,南北狭长,东西短小,形似一卧佛。此种属于依山面水布局,与后代的长安、洛阳城选址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种为临河形,以孙家城和垓下城为代表,两者均在临水的高台地上建设而成,天然的水障为城址提供了良好的防御设施。其中垓下城更是利用沱河水道的自然弧度,形成两面环水的特点。这些选址方式也多为后世所传承。

安徽史前聚落内部规划也十分科学。如凌家滩遗址内规划清晰,有居址、祭坛、墓葬、红陶土广场、巨石建筑等组团,并错落有致。尉迟寺遗址内目前已发现 14 排、18 组,共 73 间的排房聚落群体,各组排房尽管有长短之别,但布局依然井然有序,门均朝西南,即遗址的开口处。遗址内还存在一处中心大广场。

#### (三) 聚落类型丰富、规模有别

<sup>①</sup>安徽省文物局《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sup>②</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sup>③</sup>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固镇县垓下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中国文物报》2010 年 2 月 5 日。

<sup>④</sup>朔知、金晓春《安徽怀宁孙家城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08 年 2 月 15 日。

<sup>⑤</sup>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 年第 3 期。

安徽史前聚落存在两种类型,一为围壕聚落,淮北平原地区以尉迟寺遗址为代表。江淮丘陵地带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两者在营建前均经过了细致的规划,城外一般围有壕沟,聚落内有居住址、大型广场、作坊区、墓葬区等。二为城址,以垓下和孙家城为代表,两城始建年代距今5000年前后,其后不断加固堆筑,一直沿用至秦汉时期。我国最早的史前城址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头山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000多年。早期的城址多呈方形或圆形,城内规划与大型围壕聚落相似。但以现有发现和测年结果看,在5000年前后的安徽,累筑城垣似乎并不是所有大型聚落的唯一选择,这可能与聚落的位置、环境、政治等因素有关。

安徽史前普通聚落的规模早期一般在1—2万平方米左右,分布稀疏,少有特大型者。到了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时期,淮北和江淮地区开始出现了较明显的聚落分化,进而在局部形成了以大聚落为中心,中小型聚落环绕的局面,或产生带有城垣的聚落。如尉迟寺遗址,面积达8万平方米,与其相距二十公里的范围内,同属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址还有15处。按遗址面积大小,尉迟寺是唯一有10万平方米的一级中心聚落,其下还有2.5—3.5万平方米、1万平方米左右的二、三级聚落。凌家滩遗址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周边也有相应的中小聚落分布。

#### (四) 政治宗教据点的出现

以上提及的几处典型遗址与一般普通聚落有明显的区别,不仅是遗址本身面积大,可支配的人力资源丰富,个人财富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当地甚至可能已成为物品交汇的中心地。以尉迟寺遗址的围壕为例,其土方工程量经过测算,如人工开掘,需300人最少要干上一两年。凌家滩遗址面积特大,聚落布局考究,但使用时间也只有300多年,在建设初期,动用的劳力、物力之大可想而知。凌家滩遗址内出土器物,尤其是高等级的玉器,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域都存在交流,像玉龟版、玉鹰、玉龙等玉器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迹象表明,凌家滩聚落可能属于环巢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宗教中心,已经具备了城的雏形,以凌家滩遗址为中心的环巢湖区域或许存在一个古国阶段,但其政治辐射力还相对有限,目前仅局限于凌家滩遗址及其周边不大的区域。而垓下大汶口时期城址的城墙上还发现有排房遗迹,这在大汶口城址中尚不曾见,其功能或许与加强城址防卫有关。

作为先秦城邑变迁研究的起步阶段,史前时期安徽城邑材料相对丰富,脉络较清晰,类型丰富,中间缺环不多,发展进程基本与中原地区同步,现有资料表明其特点与中原地区更加接近。但在地区4000—4500年间的城址遗存相对或缺,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万国”

时代,出现了大量各类城址,及相应的群聚结构。

## 二

夏商至春秋时期,安徽境内主要为淮夷、群舒、吴越及百越的活动地区,曾发生过“涂山之会”、“夏桀奔南巢”、商人征人方、周人征淮夷、吴越楚争霸江淮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表明安徽地区与中原三代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则带有较多中原文化影响的色彩。

安徽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古代氏族文化的渊源关系,在淮北、江淮、皖南三区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表现在早晚各段、不同区域,城邑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差异。其中淮北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计有上百处,遗址大多为垆堆或漫坡状,面积大小不一。目前发现的各类城址也多分布于这片平原区域。江淮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比较密集,大多沿河流湖泊分布,多为台形或漫坡形,一般为数千至上万平方米,大型遗址有二、三万平方米,甚至超过十万平方米。这一区域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从中可以看出,该区自古以来属南北交通要道,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多种文化曾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西周时期江淮地区属于淮夷之域,分布着英、六、蓼、舒庸、舒鸠、舒龙、舒蓼、舒鲍、舒龚、宗、巢、桐等一系列淮夷偃姓小国。皖南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有广泛分布,这些遗址大多位于河流阶地,呈台形,也有的座落在山坡地带,面积一般在几千至三万平方米左右。皖西南地区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址有100多处,以皖河流域分布最集中。这类遗址大多坐落在山间盆地的平畛或河流、湖泊的漫滩上,多呈台形,面积小的有千余平方米,最大的可达五、六万平方米。此类遗址因长期使用,有的遗址下层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山区附近还有不少山坡型遗址,坐落在山区的阳坡脚或山间河流旁的高阶地上,多为漫坡状,面积小的千余平方米,大的可达万余平方米。

夏商至春秋时期安徽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数量众多,其中不乏一些至今仍保存较好的城址,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城邑发展史提供了依据。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 (一) 分布时代和地域不均等

1. 夏商时期各区域均缺少城址遗存,西周开始逐渐增多。尽管通过考古调查,已经获知了上百处夏商遗址的信息,但多属于与史前时期相似的普通聚落,大者不过十万平方米,多数仅有一至二万平米。史载夏商时期,安徽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一系列的历史重大事件均指向这片土地。经年来发现的青铜器,最早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晚期,而商代青铜器更是有较多发现,但现有的城址遗

存明显与文献和其他考古证据不相称。相比之下,经过调查断代,属于两周时期的城址则相对较多,但近年来几处西周时期的城址已被确认。因此,对其多数现存城址始建年代的考察,成为了厘清安徽三代城址演变的关键。

2. 聚落南北分布不均等。该特征延续了史前时期聚落分布特点,北部集中,南部稀少,尤其是皖南山区更加突出。目前调查所知较为集中的区域在江淮的中西部,皖南较少,且集中在沿江一带。

## (二) 聚落类别与特征明显

1. 普通聚落群。现在发现的三代时期,尤其是夏商时期遗址多为普通聚落,无城垣,外围也多无壕沟存在的迹象,这些聚落往往呈星罗棋布状分布,数量很多,使用时间也较为集中。以霍邱县为例,境内发现有 60 座台形遗址,最大的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最小的仅有数百平方米,以 1 万平方米以下的遗址居多,这些聚落遗址近一半属单纯的西周遗址,另一些使用时间可上溯至新石器时期,还有少数可能始建于夏商时期<sup>①</sup>。这批遗址中有近 10 座超过 3 万平米,其中存在作为“城”使用的可能,或可视为夏商时期的小型“城邑”。

这些普通聚落群的布局事先应该有所考虑,有一定的功能分区,并非全部以居住为主要功能。如霍山戴家院遗址<sup>②</sup>,只有一、二千平米面积,属于典型的西周遗址,遗址内废弃的陶片很少,与一般商周遗址极为不符,遗址南边缘区有一周排房分布,门前一片凹地,疑为燎祭场所,北端存在一个祭台和红烧土广场,在这处遗址的周围所做调查表明,该聚落功能性较强,而非普通的用于居住的村落。

2. 城址。安徽夏商周时期部分城址自史前起一直沿用,如垓下和孙家城遗址,以前都认为其属于汉城,而考古发掘将这些城的始建年代提前了一大段。这样的情况可能不是个例,目前许多认为属于春秋战国乃至一些汉代城址的年代可能需要重新界定。

可以确定始建于西周时期的城址也有一定数量,主要分布在巢湖的西部地区。经过著录的六安市境内的城址就有 3 座,近年来又有少量发现,尤其是六安三十铺的东城都遗址<sup>③</sup>,或被视为古六国的都城。近年来,在肥西县调查发现数座西周城址<sup>④</sup>。这些城址基本利用早期聚落营建而成。如盒墩城、墩子哄城、张马墩城等,地处丰乐河以西的江淮分水岭沿线,地势较高,规模较小,呈长方形,面积普遍在 10 万平米以下,有残存的土墙,高 5—8 米,外有壕沟围绕,均发现有多处城门。各城周围均有较多小遗址分布。

皖南沿江地区以牯牛山古城<sup>⑤</sup>为代表的小型城址也具有特色,应该与当时的铜矿采冶业有关。先秦铜矿主要分布在长江南岸的铜陵、南陵、繁昌等地,在江北的枞

阳、安庆等地也有发现,计有 20 余处。集中分布在今铜陵狮子山、铜官山、凤凰山、南陵大工山等铜矿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一般每个区域都有一群矿冶点,形成若干规模较大的古代采冶中心。关于皖南先秦铜矿遗址的年代,从出土的文化遗物和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分析,基本包括西周、春秋、战国等时期。目前已发现的铜矿遗址年代,以铜陵木鱼山、南陵江木冲两遗址最早。铜矿大量开采与中原对铜资源的需求有关。在西周金文中,有关周王朝向南方用兵征伐荆和淮夷、掠金、俘金的记载屡见不鲜。周王朝对荆楚、淮夷、南淮夷诸邦南征的重要目的极可能与攫取铜资源有关。

牯牛山古城正是处在铜矿资源集中之地,呈方形台地状,有城墙遗迹,四周环水,应是利用地势修筑而成,三面留有水口,与当时的河道相通,也有可能作为水门使用,为南方城址所特有。面积达到 20 万平方米,城址内发现铸铜遗迹和一批青铜器。城址周围也有不同数量的墩台式遗址存在,多属西周至春秋时期。在城址西南约 1 公里处,为干峰山土墩墓群,面积有数平方公里,分布着密集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曾出土过不少陶器、印纹陶器和青铜器,文物特征与城址年代相当,二者应是一个整体。墓主人或为当时的冶铸工匠。牯牛山城址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应与当时的铜矿大规模采冶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近年来铜陵师姑墩遗址<sup>⑥</sup>的发掘,更能加深对该地区聚落性质的认识。该遗址所在地三面环山,呈盆地状,盆地内共有 4 处时代相同、面积相近的遗址。遗址形态为江淮和沿江区域常见的台墩形遗址,墩呈椭圆形,现存面积约 7500 平方米。遗址内发现较多商周时期遗迹。遗址的堆积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时间阶段,早期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晚期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此外,发现了二里头时期的少量炼渣和炉壁,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从西周早期的地层开始,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逐渐增多,基本涵盖了青铜冶铸的各个环节,并发现了

①王峰《堰台遗址聚落形态考察》,《中国历史文物》2010 年第 6 期。

②朔知、怀才高《霍山戴家院遗址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 年 4 月 13 日。

③安徽省文物局《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而下文中所列诸多城址如不单独说明,则均引自《安徽文物志》,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张永新《庐西文物》,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⑤宫希成《南陵县牯牛山周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9 年》,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2—183 页。

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 年第 6 期。

陶质容器范块。联系到盆地内的其他遗址也有青铜冶铸的相关线索,则可能意味着整个聚落群都与青铜冶铸有关,或许在当时铜陵这个青铜资源重镇,青铜冶铸已是普遍现象。

总体而言,夏商至春秋早中期的安徽尚未出现大中型城址,分布范围也比较有限,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有关,远不能达到中原地区齐、鲁、燕、晋等重要诸侯国都城的规模。正如《左传·隐公元年》所言“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实为当时江淮一带方国实力的反映。这些城邑的功能较为单一,特点比较鲜明,由于面积有限,用途主要“筑城以卫君”,或具有其它特殊功能,尚缺乏市的功能。

### 三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安徽处于楚国势力的统治范围,是城邑发展的高峰时期,城址大量兴建或扩建<sup>①</sup>。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调查均有大量发现。究其分布,现存城址大多位于长江以北,尤以沿淮和淮北一带居多。已掌握的35处城址中,皖南仅有3处<sup>②</sup>。现在发现的汉代城址也可提供充分证据,共50处城址<sup>③</sup>,其中淮北有28座,江淮之间18座,皖南只有4座,考虑到城的使用有一定时间的延续,这组数据似乎也能反映战国时期各地城邑的分布情况。此时段安徽城邑发展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城邑等级存在明显差别

各类城址面积差别较大,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城址仅有寿春城,属于都城一级城址,面积在10平方千米以上;中型城有殷顶古遗址、蕲县古城、临涣古城等,面积一般在2平方千米以上;第三类城址面积偏小,边长一般短于1千米,面积不到1平方千米,如钟离古城、沈子国遗址、定远阴陵城等。后两类中一些营建于战国之前的城址在当时或作为一些方国的都城使用。而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均逐渐隶属于楚的版图之内,沦为一般的县邑采地。除寿春城考古调查工作开展较多外,其他商周时期城址还多处于简单地面调查阶段,对城址布局还缺乏深刻认识。从已有资料看,城址多临水依山而建,临泉沈子国遗址、阜南阮城等江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城址基本为方形城,钟离城北面即为淮河天堑,四周挖有护城壕。

#### (二) 城邑商业的兴起与繁荣

有些聚落由于地处水路交通要道,随着交往与贸易的增多,这些地方方便聚集了更多人口,形成一定规模,进而发展成人口繁盛的城邑。如《史记·货殖列传》谓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应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考古调查发现的合肥商周时期遗址沿南淝河流域分布较密集且有一定规律,有12处之多,其中板桥河沿岸5公里

范围内分布有3处遗址,规模多在数千平方米左右<sup>④</sup>。汉代合肥城也坐落在这一带,它的兴建与这一带聚落昌盛、人口密集不无联系。柘皋是两周时期环巢湖流域另一个重要的商贸小城镇。包山楚简即有弓矢召之地名存在,经多位学者考证<sup>⑤</sup>即《汉书地理志》庐江郡襄皋县,在今巢湖西北四十里柘皋镇。在漫长的历史流程中,它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复杂显要的政史资历,一直是皖中财物聚散的市埠,南北交通商旅的枢纽和江淮军事战略的要地。而鄂君启节铭文中提及的水陆交通路线中,也有诸多安徽的地名,如高丘<sup>⑥</sup>、下蔡、居巢、爰陵<sup>⑦</sup>、松阳等,皆为重要的贸易关口和商品集散地。寿县、凤台、肥西、六安等地,近几十年不断发现楚国的金币郢爰<sup>⑧</sup>,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城镇商业贸易的繁荣。

#### (三) 区域型政治中心的出现

寿春城为现有文献与出土文物均能指证的一处都城遗址<sup>⑨</sup>,其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虽只有19年,但城址规模已有很大的发展。据勘察,寿春城的遗址面积达26.35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代寿县城关的6倍,比楚国极盛时期的都城江陵纪南城即纪郢面积还大,仅次于战国都城燕下都,是整个江淮流域最大的政治、经济都会。因此它在楚国历史乃至整个战国时代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楚寿春城的营建,应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则寿春地区在楚都定居之前已经过了数百年的开发,至战国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二则寿春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形势险要,容易成为中心城

①如《左传·昭公四年》载“箴尹宜咎城钟离,远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

②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而得,资料待刊。

③张南、张宏明《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④巢湖流域先秦遗址调查课题组《安徽合肥市南淝河流域先秦遗址调查报告》,《文物研究》第1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49页。

⑤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湾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第49—50页;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1页。

⑥李家浩《鄂君启节铭文中的高丘》,《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⑦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安徽史学》1988年第4期。

⑧吴兴汉《楚金币的发现与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⑨丁邦均《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寿春城遗址遥感调查的新收获》,《楚文化论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市,适合于建都立国。

较为特殊的是,该时段发现的普通村落数量极少,究其原因,可能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春秋之前常见的墩台式聚落渐被废弃,人们转而选择在一些地势较高的平坦地域建房居住,与当今的村落面貌已别无二致<sup>①</sup>。当然,其原因可能不是主动的选择,而与一定的政治因素或时代大背景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安徽城邑发展的特征与中原地区相比,共性要大于个性,发展速率也逐渐接近。这与楚文化的强势浸入不无关系,楚国更早的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多方面较之淮夷和百越之地的安徽更加先进。可以说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秦时期安徽地域传统的政治模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加速了地域文化的统一,进而使得这一时期安徽城邑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更加一致的发展特征和趋势。

#### 四

关于先秦时期城邑的演变过程,《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一年而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考古学界也有由“古文化”至“古城”最后演变为“古国”的发展模式。安徽先秦城邑的演变大体也能反映出上述特征,但也有自身特点。就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归为两类:

第一种为历时性城邑。使用和延续时间较长,现存多数城址属于这一类型。该类型城址的形成,或沿袭史前时期的普通聚落,并在其基础上逐步扩建为中、大型城邑,秦汉后继续使用,并设立相应地方机构管理。如史前时期始建的孙家城和垓下古城,一直沿用至秦汉时期。蕲县古城(宿州蕲县镇境内)一段城墙就是利用西周时期的古遗址改造而成,城址主体属于东周,自秦始置到元代,这里一直是当地的政治中心,调查发现城北部有战国、秦汉、南北朝和宋代文化层。

第二种为阶段性城邑。史前时期作为政治宗教中心的大型聚落基本没有被延续使用下来。商周时期多数中小型墩台式聚落也可归为此类,其始建年代有的可能早至史前,但西周以后基本废弃,其中原委值得深究。如江淮西部一带发现的不少带有矮土垣的较大型聚落,外围可能还带有壕沟,根据调查发现,基本使用至春秋早中期即废弃,可能与群舒族群的兴衰有关<sup>②</sup>。另有一些功能性很强的城址,如皖南的牯牛山城使用时间也很有限。

从现有史前至夏商周三代的安徽城址来看,筑城年代最早也能到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原地区筑城的高峰。但后段缺环较多,尤其是夏商两代,考古发现的主要是一些中小型普通聚落遗址,与安徽境内文献记载的古城和都邑的数量极其不符。目前安徽所知最早的商周古城为六安的东城都城址,被推测为古“六国”的国都,属西周时期,但已知城址数量仍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是安徽城市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史书记载的就有郢都、州来、钟离等 20 余座,而楚简中也有 15 处左右相关县邑地名记录<sup>③</sup>。这种局面的出现,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技术的提高,带动土地的大量开发,从而也推动人口的增长,过去的小聚落逐渐扩大规模,筑城设守,变成郡县治所,带来城邑的迅速扩张,大多数地方性城镇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楚国势力的东渐和政治势力的东移,无疑也加速了一系列城镇的发展进程,如楚考烈王分封给春申君靠近齐国的淮北十二县,寿春城的扩建等。到了西汉时期,安徽先后设置的郡、县、王国、侯国治所多达 73 个<sup>④</sup>,基本覆盖安徽各地,从而形成了城邑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时期,进而也为秦汉以后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朱华东(1976—),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郝红暖

①如河南黄县三杨庄西汉古村落遗址仅有七户人家,每户宅院占地面积 260—660 平方米,宅院门向南,独立门户,院与院距离 15—30 米不等,宅院都有房屋、炉灶、土窑、砖窑、水井、厕所、畜圈、石路、垃圾堆,宅院周围栽有成排树木,并在屋后开垦农田。此类居住形态可归纳为院落式小聚居模式,与春秋之前的聚落布局有着明显区别,如追溯其源头,应该可以在战国时期找到。

②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291—293 页。

④张南、张宏明《安徽汉代城市功能初探》,《安徽史学》1991 年第 4 期。